

# 清代台湾书院的闽学脉络探析

赵威维

泉州师范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系, 福建 泉州 362000

DOI:10.61369/ETI.2025110026

**摘 要：** 清代将台湾收归版图、设置府县后，接着首要工作便是移风易俗，教化群生。在府县学之外，当地仕绅发起的书院与社学都是重要的教育辅助机构，起到为地方培育人才，提供府县儒学优秀生员的作用。由于台湾位置与福建相邻，且移居台湾多为原籍在福建地区的汉人，书院所聘任的山长、教授也多来自福建，带来的学风与学脉自然以朱熹所传之闽学为主。本文探讨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建立台湾第一所书院以来，由书院学规、书院藏书两方面所体现的闽学脉络，初步呈现清代台湾的书院在发展过程中，承继闽学的学脉所开展的人文教化工作，揭示清代台湾书院文化与闽学间的深刻关系。

**关 键 词：** 台湾书院；书院学规；书院藏书；书院教授；闽学

## An Exploration of The Fujian Scholarly Lineage in Qing-era Academies of Taiwan

Zhao Wei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After Taiwan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Qing Empire, education became central to transforming customs and promoting moral instruction. Beyond official schools, local gentry established academies that nurtured talent and advanced Confucian learning. Because most settlers and teachers came from Fujian, these academies naturally inherited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 of Zhu Xi, forming a Fujian scholarly lineage that shaped Taiwan's intellectual culture. Starting from the founding of Taiwan's first academy in 1704,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Fujian learning was transmitted through academy regulations and book collections. It analyzes how Qing-era Taiwanese academies preserved, localized, and developed Fujian scholarship in their educational practice. By tracing their curriculum, governance, and textual heritage,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se academies served not only as institutions for cultivating moral virtue and classical learning but also as cultural bridges connecting Taiwan with Fujian, embodying the shared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intellectual continuity of the Qing era.

**Keywords：** Taiwan academies; academy regulations; academy book collections; academy instructors; Fujian school of learning

清廷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将台湾收归版图后，初期由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管辖，设有一府四县二厅，依例于府县辖下设府学、县学。虽有府学、书院的设立，但台湾居民的教育文化水平仍然不高，为了扩大教化的范围与成果，故有增设书院的提议。台湾第一座正式的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设立的崇文书院，之后陆续有书院创设，目的在教育群生，移风易俗则为其首要。当时书院的山长、教师多来自福建，所宗以闽学为主。这种学术脉络的确立，体现了清代官方对边缘地区进行体制化文化建设的策略。因此，本文旨在从书院学规和书院藏书两大核心证据，探讨清代台湾书院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承继闽学的学脉，并在教化过程中展现其在地的特点，从而呈现闽学对清代台湾文化景观的深刻影响。

### 一、清代台湾书院的创制与闽学之渊源

闽学在台湾的传播，并非仅靠单纯的移民文化影响，而是透过体制性的力量进行系统性输出。福建巡抚张伯行在闽学复兴中的关键地位便可证明这一点。

张伯行任福建巡抚时，大力宣扬朱熹学说，正是闽学风气兴

盛之时。他作为坚定的朱子学者<sup>[1]</sup>，收罗闽学相关文献，编纂成《正谊堂全书》，又创建鳌峰书院亲任主讲。其中，他将朱熹所订《白鹿洞教条》与相关学规、读书法、文论、铭箴等收录于《学规类编》二十七卷，这一文献集合成为清代台湾诸书院订立学规时的重要依据。这表明闽学的植入是清廷意识形态规范化的一部分，旨在建立统一的儒学标准，确保台湾的文化教育与内地（特

别是福建）保持一致。

清代台湾各书院学规并未能全部留存，目前可见有台南海东书院、彰化白沙书院、澎湖文石书院三处。这三者在地理上横跨台湾中南部地区，其学规的创制与演变，为观察闽学在不同地区的“落地生根”提供了重要的时间与空间序列。

台南海东书院学规是全台第一个订立的学规，由刘良璧于乾隆五年（1740）订立了六条。<sup>[3]</sup>随后，乾隆二十七年（1762），台湾道兼提督学政觉罗四明以府学旁废止不用的校士院重设书院，并订立八条学规。道光十三年（1833）许德树主海东书院讲席时，也曾创立条约<sup>[3]</sup>，然此约未见流传。其次是彰化白沙书院，设立于乾隆十年（1745），原是淡水同知摄县事曾曰珙所建，“手定规条，拨田租为师生膏火之费，名曰白沙”<sup>[4]</sup>。书院后来几度被毁、重修，<sup>[5]</sup>现存白沙书院学规为知县杨桂森在嘉庆十六年（1811）所订立，共有九条。澎湖文石书院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由澎湖通判胡建伟创建，有《学约》十条，洋洋洒洒五千餘字，可见其中循循善诱之苦心。同治八年（1868）时，金门举人林豪主持文石书院<sup>[6]</sup>，编《续拟学约八条》。<sup>[7]</sup>因此海东书院与文石书院皆有两部《学约》，前后学规互相补充，跨时甚长，也由此可见学风转变与闽学的流传继承情况。

这些学规的时间序列与订立者背景，勾勒出闽学在台湾的传承体系。以下表格汇总了主要书院学规的创制情况，体现了学规订立的延续性与制度化特点：

表1 清代台湾重要书院学规汇总

书院名称	府县（今地）	学规制定年代	主要订立者	学规条数
海东书院	台湾府（台南）	乾隆五年（1740）	刘良璧	六条
海东书院	台湾府（台南）	乾隆二十七年（1762）	觉罗四明	八条
白沙书院	彰化县（彰化）	嘉庆十六年（1811）	杨桂森	九条
文石书院	澎湖县（澎湖）	乾隆三十一年（1766）	胡建伟	十条
文石书院	澎湖县（澎湖）	同治八年（1868）	林豪	八条

## 二、台湾书院学规体系特点

台湾书院的学规不仅是教育规范，更是闽学理义在边疆地区的实践纲领。尽管各书院的学规侧重有所不同，但均以朱熹《白鹿洞书院教条》为基础，并根据台湾地区的实际社会情况进行了在地化调整。

### （一）读书首要为“明伦”

朱熹《白鹿洞书院教条》第一条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sup>[8]</sup>，准此《学规》，台湾书院学规首条同是彰显伦常的规约。然而，在具体的实施中，五伦之中何者为首要，则在不同时期的学规中有着截然不同的体现，反映了政权治理策略的动态调整。

刘良璧《海东书院学规》同《白鹿洞教条》，首条“明大义”也是揭示伦常道理。“明大义”强调君臣之道、尊君亲上的伦理纲

常，提出“君臣之义为达道之首”“读书之士，知尊君亲上，则能谨守法度，体国奉公，醇儒名臣，由此以出”<sup>[9]</sup>。如此强调君臣之道的重要性，原因在于其时收复台湾已近60年，然而台湾居民教化工作的开展仍不顺利，对此“海外顽梗之风”，学规第一条便提出君臣之道的重要性，强调一切学问皆从知晓此伦理纲常开始。这种将五伦中的“君臣之义”提至首位的做法，体现了清廷在台湾进行政治治理与秩序建立的迫切需求。

随着清廷治理台湾收到一定成效，嘉庆之后社会风气有所改变，书院所强调的伦常不再单提君臣一伦，转而以五伦并举，强调孝悌之道与朋友之义。胡建伟《文石书院学规》第一条“重人伦”，以千余字的篇幅将教育宗旨揭示出来，引用朱熹《教条》内容，以“孝”为根本，认为“人能善事父母，必笃于兄弟，和于妻子；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sup>[10]</sup>。觉罗四明《学规》第二条“重师友”，虽称“师友”，但实则规范同学间应有的相处方式，要求学生非假不得随意外出，以“收师友之效”，避免放浪行为，学习乐群。规范的侧重点从政治伦理转向社会伦理的变化，标志着台湾民风受到教化的成果，政权治理策略得以下沉到社会底层的家庭伦理。

### （二）读书要旨在“力行”

书院教育除强调明人伦外，对于读书的要旨在躬行实践，这完全继承了朱熹“致知而后力行”的思想，即“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sup>[11]</sup>。

刘良璧《海东书院学规》第二条“端学则”，引程端蒙、董铢<sup>[12]</sup>所订的《程董二先生学则》的前半。朱熹赞赏此《学则》为“古人小学之遗意”<sup>[13]</sup>认为符合传统基础教育的精神，应从日常生活的种种行为规范作起，依此而行，则可达成《学规》所谓“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的成果。第三条“务实学”所称“实学”并不是事功之学，而是明体达用之学，要学者明白“内重外轻”的道理，从内而外地修养身心，才能有所贡献。觉罗四明《学规》的“敦实行”继承“务实学”的内容加以发挥，以“读书所以致用”的角度说明朱熹的读书思想，训勉学生应当于身心躬行实践，进而推广于国家社会。

杨桂森《白沙书院学规》的前三条“读书以力行为先”“读书以立品为重”“读书以成物为急”，则将力行划分为清晰的实践层次。第一条强调力行之基础在日常实践，将所学的孝悌之道与日常言行相贴合。第二条从分辨义利差别说明立品，要懂得义利之别，择善固执。第三条则解释成己成物的道理，说明所学不仅自己受用，在与他人交往时要能适时地劝诫、纠正他人的过失。陈昭瑛说此三条“论为学之本，是杨桂森用心之所在。”<sup>[14]</sup>

《文石书院学规》的“励躬行”也强调“读书不力行，只是说话也”。这些条目皆在说明朱熹所强调致知、力行的关系，揭示力行不在远处，就在日常生活的应对进退之间，以最亲近的父母、兄弟间的孝悌之道为例，说明只要察知且能行就接近圣贤境界，这对初开化的地区至为重要。

### （三）诸学各有章法，需循闽学脉络

清代乾嘉前后的书院学规，对于传统四部学术的学习方法，

主要秉持闽学的脉络。刘良璧《海东书院学规》“崇经史”点出经、史的重要性，认为学问以经史为根本，经史并重，逐步累积，不要贪求速成的文章。<sup>[15]</sup>

觉罗四明《学规》“看书理”则引用朱熹之语，说明读书应由《论》《孟》入手，且读书态度应当“不敢先立一见，横生一解。惟平气虚心，以求圣贤本意之所在。”<sup>[16]</sup>朱熹强调，学者读书应当平心静气，一字一句地从阅读经注的过程中体会涵泳，逐步累积，藉此达到通达经义的会通境界。

胡建伟《文石书院学规》认为“经，经也；史，纬也”，由学习经典而明白圣贤的道理，史书则作为辨别是非、知人任事的基础，二者应相辅相成。然而，晚清学风出现了微小的转变，林豪《续拟学约八条》里有“经义不可不明也”“史学不可不通也”两条，以朱熹之说为解经的依据，但也强调要“分别观之”，“如《周易》宜习汉学”，并将清代学者的经疏著作也纳入推荐之列，体现了学风向汉学的兼容，但仍是以宋学理义为核心。

#### （四）举业为读书最后事：教化优先于功名

书院作为辅助府县儒学的机构，虽然是以教育百姓，启迪文化为主要目的，但在时机成熟时，也不能排除参与科举考试的事业。体现在书院学规上，科举学习的位阶安排，反映书院职能的动态变化。

乾隆年间《海东书院学规》的“正文体”，提到科举文章立论的观点与行文的方法要选择正确的学习对象，即“理必程朱，法则先正，不能易也”。觉罗四明《学规》中列在最后的“习举业”引用朱熹说：“使孔子在今日也须应举”，解释应举之学与理义之学并不矛盾，举业之学以理义之学为基础，才能有独到的立论。学规将求取功名的“举业”置于德行修养之后，体现了初期的书院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器，其首要目的在于养成君子人格，而非单纯科举。

然而，随着文化成熟，书院的职能也随之转变。嘉庆年间订立的《白沙书院学规》“读八比文”“读诗”“作全篇以上者之学规”三条，针对日常课业的学习进行规范，将科举试文的写作提到学文的第一项。这反映了彰化地区在文化基础稳定后，对科名追求的提升。当时彰化县文风兴盛，清代台籍翰林有3名，彰化就占了2名；31名的进士里，彰化就有8名之多<sup>[17]</sup>，足见白沙书院提振彰化地区的文教与启迪地方英才的成效。即使追求功名，其学术规范（“理必程朱”）仍归宗于闽学，确保了闽学脉络在从政治治理到精英选拔的转变中持续发挥作用。

### 三、藏书脉络的印证：以张伯行《正谊堂全书》为中心

书院教人需有书籍，在台湾书院的发展过程里，所用书籍多从福建运送来台。书院藏书的目的在用于教学，教学的宗旨又依归于书院学规，因此书院藏书的内容成为验证闽学脉络承继的重要证明。

关于台湾书院藏书的纪录相对较少，但几条明确的记录皆指向张伯行的鳌峰书院及其所刊刻的《正谊堂全书》。首先是海东书

院，在《续修台湾县志》记载有：“自太原杨御史嘉惠海邦，衡阳刘公复修海东斋舍，选士、择师、立规以教，御史遂奏以郡学教授主讲席。考其时教授则福州薛仲寅也。昔议封张中丞始建鳌峰书院，立学规，手订课程……求师难，其人尝自掌其教。仲寅亲执业于仪封之门，与修正谊堂诸子集，卒为名进士。”<sup>[18]</sup>薛士中（字仲寅）为张伯行门人，曾跟随张伯行编纂《正谊堂全书》，为海东书院山长。薛士中既与编正谊堂诸子集，又为订《海东书院学规》，则海东书院所用书以正谊堂之书为主应是无疑，显示了学脉的直接传承。

其次是《彰化县志》卷四记载所收44部书籍，其中杨桂森所捐献的二十九部中，与闽学相关有李光地《钦定周易折中》、《钦定朱子全书》两部，又收录张伯行所编的《道统录》《思辨录辑要》《二程文集》《居业录》《李延平集》《许鲁斋文集》《胡敬斋文集》《学规类编》《罗整庵存稿》《读礼志疑》<sup>[19]</sup>等十部正谊堂书籍。这在文本层面直接印证了朱子学作为书院教学核心内容的地位。

第三，《噶玛兰厅志》卷八记载有仰山书院藏书由来：“因就鳌峰藏书中，抽发‘迁史’以下四十六种，运存仰山书院，以为诸生稽览之佐。其书多儒先语录，乃康熙丁亥张孝先伯行抚闽时，摘刻正谊堂本。”<sup>[20]</sup>时任福建巡抚孙尔准为仰山书院，从福州鳌峰书院拨书四十六种，作为书院教学之用。这些书籍除《史记》外，皆是张伯行正谊堂所刻的宋学、朱子学相关文献。

这三处明确的藏书记录横跨台湾南北与东部，证明了福州峰书院和张伯行所刻的《正谊堂全书》是清代台湾书院藏书的共同源头。这种高度一致的文献来源，超越了单纯的区域影响，证明了福州作为闽学向台湾辐射的中心，形成了明确的文献中心。清代台湾书院的用书与藏书内容，以张伯行福州正谊堂所刻的宋学、朱子学相关文献为主，直接印证了朱子学在台湾书院的全面且深入的影响。

### 四、结语

综观清代台湾书院的学规，其发展脉络清晰地指向朱熹理学在台湾的传承与在地化。从学规的内容可得以下三点：一是各家书院的学规都是以朱熹之说为基础，订立学习的规范；二是以现实情况出发，为当时的台人子弟规划“先内后外”的学习进路，即先改易风俗、调整文化风向，再求广博学识、进取功名；三是将求取功名的学习列为末端。

这三点之间相互联系，共同形塑了清代台湾的教育文化特色。清代台湾发展初期，生活与文化氛围复杂，移居者、开垦者所具有的冒险犯难、勇于争斗的想法，很容易造成族群间的分化与冲突。书院设立的目的既然是为了教化百姓，着眼点自然是在儒家人格的养成，而不在培养学者甚或为国家输送人才，因此以朱熹的教育理念为主，着重在如何以经史为根据，在日常生活的做人处事、应对进退方面培养德行，期望藉此达成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目的。这种对德行教育的优先性，正是闽学在台湾作为文化整合的长效机制的体现。

直到嘉庆之后，社会风尚有所改变，对科名的追求增加，书院的职能才逐渐转向科举人才的培养。然而，无论书院的职能如何演变，其学术依归始终未脱离闽学的框架。台湾书院学规的内容大多依据张伯行编《学规类编》，而藏书则多是《正谊堂》所

刻书，这使得朱子学“早经由书院与学规在台湾落地生根”<sup>[21]</sup>。清代台湾书院是清帝国边缘地区进行文化规范化和意识形态统一的经典案例，其中闽学的传播路径具有高度的研究价值，为台湾的儒学发展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调。

# 参考文献

- [1]陈昭瑛：《台湾传统与文化》（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再版），页 28-38。
- [2]（清）谢金銓在《续修台湾县志》卷三云：“今读刘观察所定六规，大旨平实，语有本原，疑出仲寅之手也。”指学规为薛士中所订立。见（清）谢金銓：《嘉庆续修台湾县志》卷三，《中国地方志集成·台湾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册3，页 441-442。陈昭瑛认为是薛士中所订，或者与刘良璧合订，见《台湾与传统文化》，页 38；张昆将、张溪南则认为是两人合订，见张昆将、张溪南：《台湾书院的传统与现代》（台北：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所、东亚儒学中心，2023），页 20。
- [3]陈衍编，〈许懿善 子德树〉，《福建通志列传选》（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卷6，页 319。
- [4]（清）周玺辑：《道光彰化县志》卷三，《中国地方志集成·台湾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册4，页 231。
- [5]《道光彰化县志》卷四“白沙书院”条下记云：“白沙书院，在邑治内圣庙左，乾隆十年淡水同知摄县事曾日瑛建。二十四年，知县张世珍重修。五十一年，被乱焚毁，知县宋学颢改建于文祠之西。嘉庆二十一年，署县吴性诚酬赏重新。局制较为恢大焉。”见（清）周玺辑：《道光彰化县志》卷四，页 240。
- [6]刘振维说：“八年（1868）受聘为澎湖文石书院山长，续订学约八则，主讲两年。”见刘振维：〈澎湖文石书院的始末及其基本精神〉，《止善》2009，页 90。
- [7]林文龙说：“先是乾隆年间，澎湖通判胡建伟捐建文石书院落成，尝撰学约十条……至是豪就胡撰所不及者，续拟学约八条。”林豪〈续拟学约八条〉“礼法不可不守也”云：“《纪略》原载学约，余人伦、师友、立志、诚讼之说，再三致意。兹特举其意所未备者，推而言之。”可知《续拟学约》是为补《学约》意所未备而作。林文龙：〈清末寓台诗人林豪事略〉，《台湾文献》第30卷4期，1979年12月，页 132。
- [8]（清）张伯行编：〈朱子白鹿洞教条〉，《学规类编》卷一（清康熙46年（1707）福州正谊堂刻本），叶1右。
- [9]（清）谢金銓编：《嘉庆续修台湾县志》卷三，页 439。
- [10]胡建伟〈文石书院学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清代台湾教育史料汇编》（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3）册3，页 752。
- [11]（宋）朱熹：《晦庵先生语录类要》卷9，（宋）黄士毅编：《朱子语录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册1，页 165。
- [12]程端蒙，字正思，号蒙斋；董铎，字叔重，号盘涧，二人皆为朱熹门人。
- [13]（清）张伯行编：《学规类编》卷1，叶5左。
- [14]陈昭瑛：《台湾与传统文化》，页 66。
- [15]陈昭瑛认为是薛士中编此学规时，受业师张伯行影响，故将史学列入。见陈昭瑛：《台湾与传统文化》，页 43。
- [16]（清）谢金銓编：《续修台湾县志》卷三，页 440。
- [17]张昆将、张溪南：《台湾书院的传统与现代》，页 185。
- [18]（清）谢金銓编：《续修台湾县志》卷三，页 442。
- [19]（清）周玺辑：《道光彰化县志》卷4，页 261。
- [20]（清）陈淑均辑：《咸丰台湾府噶玛兰厅志》卷8，《中国地方志集成·台湾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册2，页 728。
- [21]张昆将、张溪南：《台湾书院的传统与现代》，页 20。